



香港亞太研究所

香港人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 一個自由主義的解釋

王家英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 Yeung Yue-man, PhD(*Chic.*),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ssociate Director : Lau Siu-kai, PhD(*Minn.*), Professor of Sociology

HK\$30.00
ISBN 962-441-050-X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香港人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
一個自由主義的解釋

王家英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香港人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

一個自由主義的解釋

作者簡介

王家英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

鳴謝

本研究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計劃負責籌劃進行。在資料分析及出版的過程中，香港亞太研究所沈國祥先生、司徒美華小姐和尹寶珊小姐先後給予大力的幫助，謹此致謝。

© 王家英 1996

ISBN 962-441-050-X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摘 要

本研究運用電話調查的方法，先後探討了當前香港人的自我族群認同和中國人民族認同，以及他們的自由主義意識，並分析了它們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香港人的自我族群認同十分強烈，族群自傲感很高。與此同時，他們的中國人民族認同亦相當深厚，但偏重於對民族「性格」及民族歷史文化的肯定，對當前中國民族國家的建構和對民族未來發展的信心，卻顯得有點疏離和遲疑。此外，香港人在自我族群認同和中國人民族認同之間的定位亦呈現出頗為複雜的關係，一方面他們大多數的自我族群意識遠高於民族意識，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並從香港本位定位中國；另一方面卻頗願意幫助民族發展，有頗為清晰的現代民族意識和國家主權意識，以及頗願意加強香港人的中國民族教育。至於自由主義意識，香港人的表現並不太差，有超過六成的香港人認為自由人權較國家民族重要，同意西藏人、台灣人、香港人擁有自決權利的人數均分別佔總數三成半以上，而表示若條件許可，或會考慮移民者的總數也高達四成。更重要的是，香港人的自由主義意識與其自我族群認同和中國人民族認同明顯存在了某種複雜而微妙的關係，那就是認同自由人權、同意族群擁有自決權利、或考慮移民者，一方面輕微呈現出較強烈的香港人自我族群認同，另一方面在中國人民族認同上則出現了顯著的弱化傾向。這結果基本上印證了過去族群／民族發展的自由主義解釋：自由主義可以成為群體意識的來源、分離主義的理據和民族主義的基礎。

引言

香港只餘下一年多的時間便會從英國殖民統治回歸中國主權。儘管類似的地區主權轉移在近代世界歷史亦出現過，¹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民族國家政治（politics of nation-state）的發展中，主權轉移本身並非僅止於某從屬地域空間從某一主權政府手中轉向另一主權政府手中，而且更包含在該地域空間生長居住的族群整合進新的主權國家的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之中（Kim and Dittmer, 1993:241-44），因此當中所衍生的從屬地域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與新主權國家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之間的可能矛盾與緊張，便成為從屬地域族群及新主權國家必須盡早面對和慎重研議的問題，因為一旦認識不足，處理失當，將無可避免地會造成深遠的族群關係問題，從而危害到民族國家的整合與發展。²

雖然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之間的關係對民族國家的整合異常重要，而自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香港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中國大陸亦已成定局，但有關香港人的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的研究卻寥寥可數（Lau and Kuan, 1988:178-87; Lau, 1992:152-53; White and Cheng, 1993:180-90; Lee and Leung, 1995），而且大多集中於描述兩種認同各自的強弱和相互的關係，少有從較抽象的理論層次對之作出解釋。

本文旨在探討主權轉移前夕香港人的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的狀況，並嘗試檢視在香港社會文化中日漸生根的自由主義意識，是否對這些認同狀況構成影響。文中的資料，主要來自一項在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一日至十六日進行的電話問卷

調查，³因此除特別註明外，文中所援引的數據，均直接來自該調查的結果。

族群認同、民族認同、自由主義

認同（identity）這一概念初源於心理學，泛指人類面對其所存在的混沌世界時，對同／異（identity/difference）的一種普遍生物心理（biopsychological）需要與追尋，藉此建構其與世界的關係，盡量消除模糊與不確定感，使生活更有意義、更易於管理（Erikson, 1963）。它其後被運用於多個社會科學學科（如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而且在概念上取得大幅的擴充與發展，將心理學研究和社會學的群體互動研究貫穿連繫一起。

客觀而言，擴充與發展認同的概念內容是為了要捕捉微觀的個體心理與宏觀社會構成一體相連的辯證現象。在微觀的個體心理層面，認同一般被認為是人類動機與行為恆久不變的來源，使人類確信他們有關自己的想像、認知為真，而且不僅在他們自己的眼中看來如此，在其他他們視為重要的社會人士（significant others）的眼中看來亦復如此；在宏觀社會層面，認同又是個體意義的深層文化符碼（cultural code），使個體在社會互動中得與普遍的社會意義發生關係（Weigert et al., 1986:27-28）。簡言之，認同是個體通向社會群體的橋樑，一方面使個體取得情感和意義的安放場所，另一方面又使群體的秩序得到維繫和鞏固。與此同時，由於現實社會包涵著不同層次、不同功能的社會群體，因此個體的認同必然是紛繁而非單一的（Bond, 1993），儘管各種認同之間的關係有輕重、主從之別（王賡武，1994：233-64）。

在各種集體認同之中，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是極為重要的兩種，這可從世界各地經常發生的族群與族群之間和族群與民族之間的矛盾、衝突略窺一二。不過，在一般人的意識裡，族群（ethnicity）和民族（nation）往往交相運用，少有在概念上作出清晰明確的區分。其實二者的指涉，特別在社會科學領域，是有本質的差異的：族群泛指一般擁有相同血源、風俗習慣、文化價值等的社會群體，本身並不必具有獨立建國的政治意向，但民族的意思，卻除了要具有族群的社會文化特質外，還必須要以現代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為奮鬥的目標，本身表現出很強烈的國家政治意向（Smith, 1986）。換言之，一個族群並不必是一個民族，但一個民族卻必然包含一個凝聚力極強的族群，並從事民族國家的追尋及建設。因此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大多認為，民族主義其實就是一個族群的政治建構過程，最終的目的自然是尋求族群疆界與政治疆界的合一（Hobsbawm, 1990:9; Gellner, 1983:1; Breuilly, 1982:3）。

無疑，就血源、文化、歷史而言，居住於香港的絕大多數市民均是廣義上的華人（Chinese），對傳統的中國（包括歷史、文化、血源、地域等各方面）多存有一定程度的原初性情懷（primordial sentiments）。然而，這種原初性情懷充其量只能構成王賡武（1994：245）所謂的歷史認同，並不完全等同於以現代民族國家為目標的民族認同。如上所說，現代民族國家雖或多或少發源於傳統族群的推動，但畢竟是一新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建構，對任何傳統族群成員而言，由此政治建構所導引出的民族經驗，必然是一嶄新的經驗（Gellner, 1983; Anderson, 1983; Hobsbawm, 1990; Greenfeld, 1992; Smith, 1991）。⁴ 香港特別的地方是，在傳統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過渡之前，它已割讓了給英國，成為英國的殖民

地。此外，縱使那些經歷過中國民族主義洗禮、在一九四九年前後踏足並定居香港的華人，國共內戰的經驗，⁵ 也極可能使他們的民族認同展現出各種矛盾甚至破滅厭倦的心態。換言之，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經驗，迄今為止，多少是獨立於香港市民的現實意識之外，又或是因過去國共的對立對抗而扭曲不堪。總而言之，在過去的四十多年中，香港市民所經歷的政治現實，主要還是英國殖民統治，而非中國民族國家的建構，雖然不斷從中國大陸流入香港的新移民，也保有一定的中國民族國家經驗，但他們在全香港的人口中只是少數，並不能代表香港市民的主流經驗。

在研究族群的形成與發展上素負盛名的學者 Benedict Anderson（1983）曾經指出，近代族群意識形成的一個重要條件，是殖民疆界與統治，殖民疆界帶來了疆界內人民的共同空間意識，而殖民統治則形塑了新的族群歷史與經驗。在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前，香港雖然也處於英國殖民統治之下，但當時政治疆界的管制並不嚴厲清晰，大陸人民基本上可以自由進出香港（Endacott, 1964:4-5）。但自一九四九年之後，由於大陸移民不斷擁入，⁶ 造成管治困難，加上東西方冷戰格局隨著韓戰的爆發而快速浮現，香港政府於是自一九五零年開始，逐漸將過去的「開放疆界」（open border）收緊，取而代之的是一控制較為嚴密的移民政策（Endacott, 1964:5），從此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便出現了一較高程度的政治區隔，香港市民也開始落地生根，後來所謂的「香港意識」或香港「文化特質」（ethos）（Baker, 1983; Lau and Kuan, 1988; Choi, 1990; Chan, 1994），很大程度便是在一九五零年代以後慢慢形成的。從族群發展的角度看，這種「香港意識」或香港「文化特質」的浮現所突顯的，其實就是香港人作為一地域族群的形成，儘管這地域族群的成員

均來自中國大陸，對歷史的中國以至當今政治的中國有不同程度的認同。

無論如何，殖民政治疆界的清晰化與穩定化只是近代族群意識形成的一個重要外緣條件，任何烏合的社會集體（social collectivity）最終是否能發展成一具強烈自我意識的族群，甚至進而與原來所屬的大族群出現斷裂，並從自我族群意識的基礎走向新的民族認同，也就是走向政治上的民族主義運動，還需要取決於其他內部社會文化發展的配合。在眾多內部社會文化發展中，近年有一項較為學者所注意的，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

表面上，將自由主義和族群意識、民族意識的發展連繫一起，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因為前者以個體的獨立理性為基礎，強調的是個體的自由自主，而後者則高舉群體的原初性情愫及其產生的自然鏈帶（natural solidarity），認為群體具有某種超越的、不可還原為個體之總和的存在。

然而，上述自由主義與族群意識、民族意識發展看似相互矛盾對立的關係，近年頗受到學術界的質疑。Yael Tamir（1993）首先提出了自由主義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這一概念，從哲學的層次，論證了自由主義的群體基礎，並進而推論自由主義可以成為民族主義的依據，從而發展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他解釋，自由主義者雖沒有直接處理群體身份的問題，但其尋求的政治建構，卻明顯是以群體認同為基礎的，這包括自由主義國家中的公民權一般取決於族裔權和親屬權而非自由選擇；對其政府的政治效忠（只要此政府的行動中規中矩）而非選擇一個最為正義的政府；國家福利只分配給自己的公民，對其他並非自己公民的需要卻大多袖手旁觀（Tamir, 1993:117）。不僅如此，自由主義既需要在群體中體現、實踐，當群體的形成與發展建基於自由主義的理

想和價值（如對個體自由、權利的追尋與捍衛），甚至直接以自由主義的理想與價值作為集體建構的目標，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的出現，便更是自然不過了（Tamir, 1993:9）。

Harry Beran（1984:24-5）便指出，民族主義的一支——分離主義（secession），其理論基礎其實就是自由主義，因為按照自由主義的原則，最理想的社會是一個最接近自願結合的社會，而國家的統一也可視為自願性的結合，故此國家中部份成員要求分離，另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只要現實上可行的話，是應該得到容許的。吳乃德（1994）沿著相同的思路，並配以量化的問卷調查研究，最後亦證明，自由主義是台灣分離主義的一個重要基礎。

同樣地，Liah Greenfeld（1992）也從實證發現，美國人民族認同形成的核心基礎，並不是其傳統族群（特別是其宗主國英國）文化的特殊性質，而是其獨立建國的合法性基礎英國憲政原則。Greenfeld 指出，英國憲政的核心價值是民主和自由，其所象徵的是普遍主義（universalism）而非一般族群文化所強調的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當日美國十三州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獨立建國的主要訴求，便是實踐英國憲政理想，以自由主義的普遍性作為美國的立國精神，藉此否定英國殖民統治種種不平等支配的合法性。對早期的美國移民而言，美國吸引人的地方，不僅是這地方物質豐饒，也同時是它高舉民主和自由。事實上，從建國開始，民主和自由一直成為美國人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礎，也是美國人國民教育的一項主要內容（Greenfeld, 1992:446）。

如果自由主義可以成為群體意識的來源、分離主義的理據和民族主義的基礎，在自由主義日益高漲的當今世界，可以想像，其對族群與族群之間的關係、族群與民族之間的關係和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係的影響應是異常巨大的。Jürgen

Habermas (1994) 便認為，自由主義積極建立的民主公民 (democratic citizenship)，已日益成為現代民族認同的其中一項核心價值，一方面對傳統的、以集體主義為導向的民族認同產生了嚴重的衝擊（如前蘇聯），另一方面又催生出新的民族整合（如歐共體作為單一民族國家的浮現）。

英國在香港的統治雖非民主政治，但經濟上採取的自由貿易主義 (*laissez-faire*) 和社會文化上推行的盡量不干預政策 (non-intervention)，基本上與自由主義的精神銜接，對香港人的集體意識有很深的影響 (Lau and Kuan, 1990)。此外，自香港的九七回歸確定後，基於種種原因（如港英政府推動代議政制、民主抗共、本地精英對撤退中的港英政府留下的權力真空的爭逐等），香港亦出現了某種有限度的民主化過程 (Kuan and Lau, 1995)。當社會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與政治上的民主化逐漸匯合，自然會進一步強化、加深香港人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和肯定，從而或多或少會影響到香港人在後過渡期的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⁷

無論如何，先讓我們回頭看看當前香港人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狀況。

香港人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

與過去的研究結果相似 (Lau and Kuan, 1988; Lau, 1992; Lee and Leung, 1995)，我們的調查發現，香港人的自我族群認同（亦即是以香港人為本位的意識）相當強烈。表一顯示，有 88.6%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香港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全賴香港人聰明努力」；有 80% 同意／十分同意「香港是最幸福的中國人社會」；有 79% 同意／十分同意

「香港的經濟是世界最有活力的經濟」。從上述的數據中，顯而易見，香港人無論對香港人的族群「性格」、香港社會在中國人社會的地位和香港在世界經濟中的活力，均有極高的評價與肯定，族群自傲感甚強。尤其是香港人對其族群「性格」——聰明努力——的認同，更是高度一致，不認同的（不同意／十分不同意）僅有微不足道的 2.5%。

另一方面，雖然香港人表現出強烈的自我族群認同，但與此同時，他們對中國人的認同並不薄弱，儘管這中國人認同未必具有深刻的民族政治建構的內涵（有關這一點，下文將會有更多的論及）。我們的調查指出，有 87.8%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中國人勤奮上進，競爭力強」；有 76.3% 同意／十分同意「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文化悠長深厚，值得驕傲」；有 53.1% 同意／十分同意「中國已經發展起來，下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值得注意的是，單就上述的數據而言，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明顯偏重於民族性格（勤奮上進）及歷史文化的肯定，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信心，卻相對低落，尤其是比較於他們對香港在世界經濟中的活力的高度肯定，二者之間信心的強弱相當分明，究其原因，當然不排除他們對客觀現實的評估（如香港經濟確比中國大陸經濟好很多），但由中港兩地長期政治分離發展導致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之間的「親疏」或「近遠」之別，亦應有一定的影響。

表一：被訪者的香港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

	十分 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十分 同意	不知道/ 不清楚
香港有今天的成就全賴香港人聰明努力	0.3	2.2	8.0	72.9	15.7	0.9
香港是最幸福的中國人社會	0.1	9.7	8.3	70.4	9.6	1.9
香港是世界最有活力的經濟	0.2	7.0	8.1	71.4	7.6	5.7
中國人勤奮上進，競爭力強	4.4	7.4	0.0	77.8	10.0	0.4
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文化悠長深厚，值得驕傲	0.1	10.4	11.1	67.7	8.6	2.2
下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0.8	21.2	15.0	48.9	4.2	10.0
(N=1,556)						

此外，相關分析顯示（見表二），上述初步勾劃出的香港人自我族群認同和他們的中國人認同不僅沒有出現相互衝突否定的情況，而且所有指標之間均存在統計學上顯著（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的正關係，相關係數也有一定的強度，最強的一組是香港人的族群性格與中國人性格，高達 0.2935，最弱的一組是香港人的族群性格與下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但仍有 0.1509 之強。換言之，就上述選用的指標來說，香港人的自我族群認同和他們的中國人認同基本上存在於某種相對和諧、互相促進的狀態，香港人認同的發展並不妨礙中國人認同的發展，甚至有助中國人認同的發展，相反亦然。

表二：被訪者的香港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的相關分析¹

	香港的成就 全賴香港人 聰明努力	香港是最 幸福的中國 人社會	香港是世 界最有活 力的經濟	中國人勤 奮上進， 競爭力強	中國地大 物博，文 化深厚， 值得驕傲
香港是最幸福的中國人社會	.2637*				
香港是世界最有活力的經濟	.1962*	.2244*			
中國人勤奮上進，競爭力強	.2935*	.2176*	.2773*		
中國地大物博，文化深厚，值得驕傲	.2284*	.2145*	.2096*	.2825*	
下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1509*	.1890*	.1678*	.1934*	.2830*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5。

註：1. 表內所有指標之量度均由 1 = 「十分不同意」至 5 = 「十分同意」。

上述的分析畢竟只是靜態地觀察香港人的自我族群認同和中國人認同。在這二者之間，他們究竟如何取捨、如何定位呢？首先，當被問及當考慮到他們的身份時，他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好些還是中國人好些時，有 36.3% 的被訪者回答中國人，回答香港人的有 49.0%，回答兩者都是的有 11.2%，回答兩者都不是的有 0.5%，而回答不知道／不清楚的則有 3.0%。換言之，儘管在行將回歸中國前夕，認同香港的市民仍遠較認同中國的為多。不過，必須指出，相較於劉兆佳過去歷年的同類研究，認同香港的市民似乎已正在減少，而認同中國的則正在增多（Lau, 1992:152）。⁸

當然，單是一般性地詢問香港人在其自我認同與中國人認同之間的定位，只能使我們對有關問題得出一個抽象的理解，要越過這抽象的理解，進一步把握其內在的具體複雜關係，還需要探討他們對此問題的各種相關看法。

表三臚列的正是被訪者對此問題的一些相關看法的結果，綜合之後，最少包含了如下的特點：

1. 香港人的族群本位意識遠比民族意識為強：有 67.5%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中國要發展，就要多學習香港，使中國香港化」，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只有 17.8%；有 74.2%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當中國的利益與香港利益出現矛盾的時候，當然要站出來支持香港的利益」，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只有 9.8%。這兩項態度明顯透露，大多數香港人對香港過去的發展感到相當優越、驕傲，並從這樣的立場看中國未來的發展，因此才會持「中國應香港化」的態度。相信也因為這種強烈香港本位意識的影響，他們才會將香港利益擺放在高於中國利益的位階。

2. 香港人雖然自我族群本位意識強烈，但現代民族意識和國家主權意識仍頗為清晰：有 67.7%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中國的問題，包括港澳問題和台灣問題，是中國人的問題，應該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不應該找外國人幫忙」；有 57.2% 同意／十分同意「中國派解放軍進駐香港是必須的，因為不如此做便不能夠體現中國在香港的主權」；有 50.5% 同意／十分同意「中國人就是中國人，不應該擁有雙重國籍」。國家內政不應訴諸外力、領土駐軍、單一國籍理念等均是現代民族國家的主流價值，過半數的香港人既認同這些價值，多少顯示他們的自我族群認同並沒有完全模糊他們的中國民族國家認同。須知道，若單從現實主義或族群本位的角度考慮同樣的問題，結果很可能並不一樣，特別是像解

放軍駐港、單一國籍等問題，均曾在香港造成巨大的爭議。由此可以猜測，在考慮上述的問題時，民族認同應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3. 香港人頗願意幫助中國的民族發展：有 57.8%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為了國家的富強，個人利益有時應該放開一邊」，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只有 21%；有 42.8% 同意／十分同意「香港如果有財政盈餘，應該撥一部份給中國政府發展大陸」，雖然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也有 39.7%。表面上，這一點似乎與上述第一點存有一定的矛盾：既然第一點指出，大多數香港人將香港利益的位階凌駕於中國利益之上，又怎會願意真心幫助中國的民族發展呢？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點強調的是香港利益與中國利益出現矛盾時香港人的自我族群利益傾向性，但問題是，這種自我族群利益的傾向性既不是香港人所特有，在其他民族國家亦經常出現，也不一定意味對民族利益的否定。後者的理由很簡單，族群利益與民族利益並非必然存在於矛盾的狀況，因此之故，香港人在強調自身族群利益的同時，自然可在其他方面幫助中國的民族發展。

4. 香港人頗願意加強民族教育：有 89.0%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要做好中國人的本份，便應該多認識中國過去的歷史與文化」；有 82.1% 同意／十分同意「為了民族成員間的溝通方便，香港人應該努力學習普通話」；有 53.8% 同意／十分同意「身為中國人，當然要學會唱國歌」，儘管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被訪者也有 32.8%。在這三種態度中，香港人對歷史文化教育和國語教育的肯定幾乎是毫無異議，這印證了早前的發現：香港人的中國民族認同以歷史文化為主要內容。相比之下，香港人對唱「國歌」所表現的疑慮，多少反映出他們對其民族認同中的政治建構——中華人民共

和國——所存在的一定疏離甚至抗拒，原因是唱國歌是現代民族認同的一種直接表現和實踐，國歌象徵民族和國家。不過，香港人在這方面表現出的矛盾其實也可以理解，正如前面說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建構過程，很大程度是在他們的現實經驗之外，因此對唱其國歌產生某種排拒，也是人之常情；相反，香港既是一個中國人的社會，香港人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認同，自然可不知不覺地於日常生活中濡染形成。

表三：被訪者的香港人認同定位與中國人認同定位（%）

	十分 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十分 同意	不知道/ 不清楚
中國人不應擁有 雙重國籍	1.5	31.0	8.2	45.2	5.3	8.8
個人利益有時應 從屬國家利益	0.6	20.4	13.3	54.1	3.7	7.9
中國人應會唱 國歌	1.2	31.6	10.1	49.0	4.8	3.2
香港人應學習普 通話	0.2	9.5	7.2	71.6	10.5	1.1
香港應財政資助 大陸	2.6	37.1	9.8	40.7	2.1	7.8
解放軍駐港體現 主權	1.7	25.3	9.8	52.8	4.4	6.0
中國人問題應由 自己解決	0.9	17.3	7.8	57.8	9.9	6.3
中國人應多認識 中國歷史文化	0.3	5.0	3.8	78.4	10.6	1.9
中國應香港化	0.6	17.2	10.9	60.6	6.9	3.8
香港利益高於中 國利益	0.3	9.5	8.9	65.7	8.5	7.1

若進一步察看被訪者的香港人認同／中國人認同與他們在兩者之間的定位的相關分析（表四），有兩點是十分明顯的：

1. 雖然前面說過，香港人的自我族群認同與中國人認同之間不僅沒有明顯的矛盾，而且還呈現出正面的互促關係，但比較而言，在所有呈現顯著相關性的指標關係中，中國人認同指標較香港人認同指標在偏向中國認同定位的指標上呈現出較強的相關性（相關係數較大），而在偏向香港定位的指標上則呈現較弱的相關性（相關係數較小）。

2. 明白地表示其香港人認同高於中國人認同的被訪者，在所有偏向中國認同定位的指標上均呈現出顯著的負相關，而在偏向香港定位的指標上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此外，不論相關係數是正還是負，除兩項外（中國人應多認識中國歷史文化和中國應香港化），其強度還不算弱（均在 0.1 至 0.2 之間）。

若將上述兩點發現進一步結合一起分析，我們可以這樣說，雖然香港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之間並不必然互相矛盾衝突，但當二者形成主從關係的時候，主的一方卻會倒過來壓抑從的一方的發展。例如，強調香港人認同者會壓抑其中國人認同的發展；相反，強調中國人認同者會壓抑其香港人認同的發展。

表四：被訪者的香港人認同和中國人認同與香港人認同定位和中國人認同定位的相關分析¹

	香港的成就全 賴香港人聰明 努力	香港是最 幸福的中 國人社會	香港是世 界最有活 力的經濟	中國人勤 奮上進， 競爭力強	中國地大物博， 文化深厚，值得 驕傲	香港人/ 中國人
中國人不應擁有雙重國籍	.0799*	.0676*	.1056*	.1898*	.1797*	.2048*
個人利益有時應從國家利益	.0780*	.0779*	.0983*	.0778*	.1500*	.1855*
中國人應會唱國歌	.0840*	.0842*	.1474*	.0712*	.1643*	.2298*
香港人應學習普通話	.0995*	.0815*	.1557*	.1236*	.1752*	.1876*
香港應財政資助大陸	.0061	.0503	.0430	.0899*	.1062*	.1902*
解放軍駐港體現主權	.0572*	.0223	.0841*	.0989*	.1606*	.1774*
中國人問題應由自己解決	.0969*	.0807*	.1147*	.0892*	.1647*	.2088*
中國人應多認識中國歷史文化	.0765*	.0962*	.1247*	.1292*	.2008*	.1335*
中國應香港化	.1663*	.1964*	.0585*	.1341*	.1076*	.1408*
香港利益高於中國利益	.1735*	.1958*	.0856*	.1692*	.1400*	.0666*
香港人/中國人	.0043	.0028	-.0266	-.0350	-.0323	-.1262*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5。

註：1. 表內所有指標之量度，除香港人/中國人一項外，均由 1 = 「十分不同意」至 5 = 「十分同意」；香港人/中國人之量度為 0 = 「中國人」，1 = 「香港人」。

測量自由主義的指標：

香港人對自由人權、族群自決權利和移民考慮的態度

本文曾在前面指出，一些學者認為自由主義對現代社會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的發展存有某種促進或分離的作用：它可以成為族群/民族自我建構的目標或基礎，但又可化作族群/民族內部分裂的理據。此節要檢視的正是香港人的自由主義意識。然而，我們不僅僅直接詢問被訪者對自由主義價值（如自由人權）的認同程度，而是挑出三組與自由主義密切關連的指標——自由人權、族群自決權利（獨立建國）和移民考慮，然後就這些指標探討他們有關的態度。從這樣的一個角度理解香港人的自由主義意識，基本上來自早前論及的有關 Harry Beran 的分離主義理論。Beran 認為，分離主義的理論基礎其實就是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強調社會成員的結合或分離，應該是自願性的。就這一點而言，我們特別挑出自由人權、族群自決和移民考慮，以探討香港人的自由主義意識，主要的考慮是：（一）自由人權反映的是一般的抽象理念；（二）族群自決權利反映的是宏觀集體的自由權利；（三）移民考慮反映的是微觀個體的自由權利，如此一來，抽象的理念認同、宏觀的集體看法與微觀的個體行動便能同時照顧到。

首先，對於自由人權的認同，我們詢問的問題是：「在國家民族與自由人權之間，你認為何者較為重要？」結果有 60.1% 回答自由人權，回答國家民族的只有 13.5%，回答兩者一樣重要的有 20.8%，回答兩者均不重要的有 0.8%，而回答不知道/不清楚的有 4.8%。換言之，單就自由人權和國家民

族的抽象對比而言，大多數香港人明顯是先自由人權而後國家民族的。

然而，當我們進一步探索他們對中國不同族群的自決權利的態度時，上述這種傾向明顯出現很大的縮減。表五顯示，只有 41.5%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西藏人有自決的權利（原問題是「假如西藏的人民舉行全民投票，通過要脫離中國而成為獨立國家，你是否同意他們有這樣的權利？」）；⁹ 同意台灣人有自決權利的有 39.4%；而同意香港人有自決權利的有 38.2%。¹⁰ 明顯地，此三項百份比均較高達 60.1% 表示自由人權比國家民族重要的被訪者少了很多。這一點多少可以證明，儘管在理念的層次上大多數香港人認為自由人權較國家民族來得重要，但一旦牽涉到具體民族利益選擇的層面時，他們當中很多便會感到遲疑而甚至有所轉向了。

值得注意的是，從西藏人到台灣人再到他們自己本身，香港人似乎對族群自決權利的態度均有不同的標準，這可從三者緩慢遞降的百份比看得出來。這亦即是說，在族群自決權利的態度上，香港人對西藏人寬鬆些，對台灣人次之，對自己本身最為嚴苛。不過，這背後的原因並不十分清楚，當中可能牽涉到血源文化（如西藏人並不是漢人）、政治現實（台灣現實上分離於中國大陸）、自身民族感情、現實考慮（香港與中國關係太過密切）等種種考慮，要等到將來作出進一步研究時才能澄清。然而，撇開這一點不論，單就三項族群自決權利同意者的百份比而言，香港人的自由主義意識是絕對不低的了。

另一方面，當被問及如果能力許可的話，他們會否考慮移民時，有 58.4% 的被訪者回答不會，回答可能會的有 5.6%，回答會／已經辦妥的有 32.1%，而回答不知道／不清

楚的有 4.0%。顯而易見，從個體的角度看，在必要時離開其所屬的族群或民族不僅是大多數香港人認為一種高於民族國家的自由人權，而且更有為數不少的人確實會／可能會作出移民的考慮。不過，有關這一點的解釋必須較為小心，避免過度詮釋（overinterpreted），因為導致考慮移民的因素很多，並不必然意味族群認同或民族認同的弱化，事實上，很多研究早已指出，一些人士雖落籍他國經年，但對其原來所屬族群或民族的認同卻依然強烈如故（Ujimoto and Hirabayashi, 1980）。

表五：被訪者對族群自決權利的態度（%）

	十分 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十分 同意	不知道／ 不清楚
西藏人有 自決權利	2.8	32.8	4.8	39.1	2.4	18.1
台灣人有 自決權利	3.6	37.1	4.3	37.6	1.8	15.5
香港人有 自決權利	4.5	40.6	3.9	35.3	2.9	12.8

無論如何，相關分析顯明，被訪者的自由人權態度、族群自決權利態度，和移民考慮態度三者之間，均存有顯著的相互關係（參看表六）。從相關係數的強度看，西藏人有自決權利、台灣人有自決權利和香港人有自決權利三者之間的關係最強，相關係數最高的達 0.7551，而最低的也有 0.6594；其次是國家民族／自由人權與三項族群自決權的關係，三組相關係數均在 0.35 至 0.37 之間；最弱的是考慮移民與國家民族／自由人權和三項族群自決的關係，相關係數全

部徘徊於 0.19 至 0.22 之間。對於上述相關係數的強度層層遞減應該是不難解釋的。首先，三項族群自決權利指標只屬同性質意向的三方表態，相互之間存在了高度相關性根本一點也不足為怪。其次，國家民族／自由人權所測試的是被訪者對個體自由權利的態度，相對的背景則是國家民族，而三項族群自決權利所測試的何嘗不是被訪者相對於國家民族的個體自由權利態度？只不過後者的個體自由權利以自願結合的族群自由權利的形式呈現吧了，故此兩類指標之間存在了中度的相關性，也是極之合理之事。最後，考慮移民與其他各項指標之間的相關性最弱，多少應是由於考慮移民者多以實際利益考慮為前提，少有預先考慮到國家民族等大問題，由此而與其他以國家民族為思考背景的指標存在較弱的相關性，不是也很自然嗎？雖然如此，必須強調，所謂強弱，只是相對性的，在一般的社會科學研究中，0.7 的相關係數固然很強，但 0.2 的相關係數卻並不太弱，尤其是像自由主義這樣一類複雜抽象的概念，根本不可能找到一個完美無瑕的單一指標，因此重要的反而是我們如何運用我們所建立的指標，對有關現象作出謹慎合理的解釋。

表六：被訪者的自由人權態度、族群自決權利態度和移民考慮態度的相關分析¹

	國家民族／自由人權	西藏人有自決權利	台灣人有自決權利	香港人有自決權利
西藏人有自決權利	.3779*			
台灣人有自決權利	.3735*	.7473*		
香港人有自決權利	.3557*	.6594*	.7551*	
考慮移民	.1991*	.1918*	.2165*	.2096*

*者表示經兩端驗顯著度小於 0.05。

註：1. 表內所有指標之量度，除國家民族／自由人權和考慮移民兩項外，均由 1 = 「十分不同意」至 5 = 「十分同意」。國家民族／自由人權之量度為 1 = 「國家民族」，2 = 「自由人權」；而考慮移民之量度為 1 = 「沒有考慮」，2 = 「可能考慮」，3 = 「考慮」／「已辦妥」。

自由人權、族群自決權利和移民考慮態度與香港人認同和中國人認同的關係

究竟香港人的自由人權態度、族群自決權利態度和移民態度與其自我族群認同和中國人認同之間存在了些甚麼關係呢？從表七列出的相關分析看，答案無疑是稍為微妙複雜的，以下是一些歸納出的特點：

1. 國家民族／自由人權和三項族群自決權利態度與香港人自我族群認同並沒有存在任何顯著的關係。換言之，香港人對國家民族／自由人權和各項族群自決權利的看法，並沒有對其香港人意識構成影響。

2. 除了兩處例外之外（國家民族／自由人權與「中國人勤奮上進，競爭力強」，和西藏人有自決權利與「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文化悠長深厚，值得驕傲」），國家民族／自由人權和三項族群自決權利態度與所有三項中國人認同指標均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儘管這些相關係數的強度均屬有限，有些甚至只有 -0.05 至 -0.06 的強度（如國家民族／自由人權和香港人有自決權利在「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文化悠長深厚，值得驕傲」的表現）。無論如何，從所有相關係數均為負關係看，認同自由人權較國家民族重要，或同意西藏人、台灣人或香港人有自決權利，明顯地會對中國人認同產生某種壓抑的效果。

3. 除一項外（「香港是世界最有活力的經濟」），考慮移民和所有香港人認同和中國人認同指標均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這一點多少說明了考慮移民作為一種離開所屬族群／民族的打算，確實與族群認同／民族認同的弱化有關。

表七：被訪者的自由人權態度、族群自決權利態度和移民考慮態度與香港人認同和中國人認同的相關分析¹

	國家民族／ 自由人權	西藏人有 自決權利	台灣人有 自決權利	香港人有 自決權利	考慮移民
香港有今天的成就全賴香港人聰明努力	.0068	.0151	-.0276	-.0091	-.0616*
香港是最幸福的中國人社會	-.0257	-.0288	-.0320	-.0154	-.0828*
香港是世界最有活力的經濟	-.0383	.0104	-.0109	-.0459	-.0449
中國人勤奮上進，競爭力強	-.0395	-.0688*	-.1103*	-.0737*	-.0675*
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文化悠長深厚， 值得驕傲	-.0651*	-.0552	-.0954*	-.0582*	-.0949*
下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1486*	-.1631*	-.1668*	-.1331*	-.1816*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5。

註：1. 表內所有指標之量度與前述各表所列一致。

最後，表八進一步列出族群自決權利態度和移民考慮態度與香港人認同和中國人認同定位的相關分析，得出的結果基本上與上述歸納的關係十分相似，包括：

1. 國家民族／自由人權和三項族群自決權利態度與所有定位於中國認同的指標呈現顯著的負相關，但與定位於香港認同的指標則多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這亦即是說，認同自由人權或同意西藏人、台灣人或香港人有族群自決權利者，均對定位於中國認同的指標有所保留，而對定位於香港認同的指標則有所偏好。此外，撇開正負關係，所有呈現顯著關係的相關係數的強度並不算太弱，絕大部份均介乎 -0.1 至 -0.2 之間。

2. 單就香港人／中國人一項而言，強調自由人權多於國家民族，以及對各項族群自決的權利表現支持態度的人士，明顯傾向認同香港，相反亦然。還有，二者之間的相關係數的強度亦十分可觀，最弱的也有 0.2811，而最強的則達 0.3628。

3. 考慮移民與定位於香港認同的指標並沒有存在顯著的关系，但與所有定位於中國認同的指標則呈現顯著的負關係，而且相關係數並不太弱，多介乎 -0.1 至 -0.2 之間。換言之，考慮移民者雖沒有以香港本位定位中國的傾向，但卻傾向反對以中國本位定位香港。此外，考慮移民者較傾向強調自己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而兩者之間的相關係數（0.2462）亦有一定的強度。

表八：被訪者的自由人權態度、族群自決權利態度和移民考慮態度與香港人認同定位和中國人認同定位的相關分析¹

	國家民族／ 自由人權	西藏人有 自決權利	台灣人有 自決權利	香港人有 自決權利	考慮移民
中國人不應擁有雙重國籍	-.2195*	-.2271*	-.2443*	-.1676*	-.2459*
個人利益有時應從屬國家利益	-.1835*	-.0967*	-.1233*	-.1315*	-.0924*
中國人應會唱國歌	-.2554*	-.2020*	-.2378*	-.2337*	-.1453*
香港人應學習普通話	-.0880*	-.0780*	-.1123*	-.1501*	-.0667*
香港應財政資助大陸	-.1319*	-.1214*	-.1211*	-.0923*	-.1452*
解放軍駐港體現主權	-.2184*	-.2175*	-.2706*	-.2463*	-.1724*
中國人問題應由自己解決	-.2277*	-.2298*	-.2867*	-.2421*	-.1802*
中國人應多認識中國歷史文化	-.1339*	-.0600*	-.1156*	-.1266*	-.0714*
中國應香港化	.0590	-.0071	-.0198	.0874*	-.0415
香港利益高於中國利益	.1558*	.1032*	.0670*	.1341*	.0095
香港人／中國人	.3628*	.2811*	.3293*	.3232*	.2462*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5。

註：1. 表內所有指標之量度與前述各表所列一致。

結論與討論

本文先從族群概念與民族概念出發，探討了當前香港人的自我族群認同和中國人民族認同的狀況。結果發現，香港人的自我族群認同十分強烈，無論對香港人「聰明努力」的族群「性格」、香港社會在中國人社會的地位或是香港在世界經濟中的活力，均有極高的評價與肯定，族群自傲感很強。與此同時，他們的中國人民族認同亦相當深厚，但偏重於對民族「性格」及民族歷史文化的肯定，對當前中國民族國家的建構和對民族未來發展的信心，卻顯得有點疏離和遲疑。

此外，香港人在自我族群認同和中國人民族認同之間的定位亦呈現出頗為複雜的關係，一方面他們大多數的自我族群意識遠高於民族意識，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並從香港本位定位中國；另一方面卻頗願意幫助民族發展，有頗為清晰的現代民族意識和國家主權意識，以及頗願意加強香港人的中國民族教育。還有，相關分析透露，香港人的自我族群認同與中國人民族認同並沒有存在必然的矛盾或衝突，不過，當二者形成主從關係的時候，主的一方確實會倒過來壓抑從的一方的發展。

由於許多學者指出，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的形成與自由主義的發展存有很密切的關係，本文特此選擇了三組頗能反映自由主義的指標——自由人權、族群自決權利和移民考慮，並就此探討了香港人的相關態度，以及將這些態度與他們的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態度進行了相關分析。結果顯示，香港人的自由主義意識並不太低，有超過六成的被訪者認為自由人權較國家民族重要，同意西藏人、台灣人、香港人擁

有自決權利的人數均佔總數三成半以上，而表示若條件許可，可能會考慮／會考慮／已辦妥移民者的總數也高達四成。

更重要的是，此三組自由主義指標與香港人的自我族群認同和中國人民族認同確實存在了某種複雜而微妙的關係，那就是認同自由人權、同意族群有自決權利、或考慮移民者，一方面輕微呈現出較強的香港人自我族群認同，另一方面在中國人民族認同上則出現了顯著的弱化傾向。這結果基本上印證了過去族群／民族發展的自由主義解釋：自由主義可以成為群體意識的來源、分離主義的理據和民族主義的基礎。

對於分別快將面臨主權回歸的香港及主權收回的中國而言，這樣的結果即時帶出了一個問題：自由主義既會強化香港人的自我族群認同和弱化他們的中國人民族認同，如果九七年主權回歸之後自由主義仍繼續在香港發展，那豈不是會造成未來中國民族整合的困難？而要消除這困難，方法似乎只有兩個：減慢甚至終止香港的自由主義發展以符合中國當前的民族建構，或是在中國大陸推廣自由主義以銜接香港的認同需要。然而，不論是哪一個方法，又或是在這兩個方法之間的平衡折衷，其本身便牽涉到複雜的族群／民族政治問題，已非本文所能論說決定，而是需要學術界及中港雙方作出進一步的探討與研究，以尋求更多的瞭解與共識。

註釋

1. 魁北克於一七六六年從法國殖民統治轉移到英國殖民統治，和台灣於一九四五年從日本殖民統治回歸中華民國主權，便是較爲人所知道的例子，雖然性質並不全然相同。
2. 加拿大法裔魁北克分離主義和台灣的省籍矛盾以至台獨主義問題，很大程度均源自族群之間的相處與整合問題，而這些問題，亦已威脅到它們本身民族國家發展的穩定性。
3. 是次電話調查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計劃負責籌劃及進行。此調查的抽樣方法分爲兩個步驟。第一步，從最新的香港住宅電話簿（一九九五年英文版）中隨機抽出 5,386 個電話號碼；爲了使未刊載之住宅電話號碼也有機會被選中，我們將已抽選的電話號碼最後的兩個數字刪去，再配上由電腦產生的隨機數字，成爲是次調查的樣本。第二步，當成功接觸住戶後，再用出生日期抽取其中一名十八歲或以上的家庭成員作爲訪問對象。調查於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一日至十六日，每晚六時至十時進行。在 5,386 個電話樣本中，有 1,201 個發現線路有問題（包括長鳴、傳真機等）或非住宅電話，另外有 831 個無人接聽（經兩次不同時間嘗試）。最後成功接觸住戶的樣本數目爲 3,354 個。當中有 1,034 個拒絕受訪，另外有 764 個無適當被訪者（例如外籍人士或沒有成人在家等等）。最後成功訪問了 1,556 人。排除無適當被訪者，是次調查的成功回應率爲 60.1%。以百分之九十五的可信限度推估，抽樣誤差約在正負 3% 以內。
4. 粗略而言，民族國家之所以是一嶄新的經驗，是因爲以國家（state）的中央化政治力量，自覺地從事民族的建構與整合

- （national building and integration），人工性十分濃厚，與傳統族群的自然生成有很強烈的對立意味。
5. 從政治意識形態看，國共兩黨終不免走向互相殺戮否定的戰爭，彼此之間對中國未來民族國家建構的各執己見，分裂爲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很大程度突顯了民族主義中的民族的人工建構的想像特質，也符合了 Benedict Anderson（1983）有關民族主義即「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的論述。
 6. 據 G.B. Endacott（1964:197）指出，單從一九四九年初到一九五零年春，便有約 776,000 難民從中國大陸湧入香港，使香港社會經濟幾乎癱瘓。
 7. 例如，王家英、沈國祥（1996）所做的一個有關後過渡期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的調查便顯示，超過五成的被訪者在面對九七主權過渡時，認爲他們最憂慮的問題主要是民主、自由和人權。
 8. 據劉兆佳的研究指出，一九八八年有 63.6% 的被訪者認爲自己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認爲自己是中國人多於香港人的有 28.8%。但到了一九九零年，前者是 57.2%，後者則是 26.4%。不過，必須指出，兩個研究的設計稍有不同，一九八八年的研究並沒有提供被訪者「同是香港人和中國人」的選擇，而一九九零年的研究則有。
 9. 此問題仿自吳乃德（1994）有關研究的問法，不敢擅奪，特此註明。
 10. 必須指出，此問題的焦點是自決的權利而非自決的內容，故此我們應該將同意族群擁有自決權利和支持族群自決作出區分。事實上，筆者曾在另一個研究中詢問過香港人對台獨的支持，結果支持者只佔 27%（王家英，1995）。

參考文獻

- 王家英 (1995), 〈民族認同與兩岸互動——香港人對兩岸三地關係的態度初探〉, 《中華經濟協作系統》第三屆學術研討會論文, 台北, 1995 年 12 月 15 日。
- 王家英、沈國祥 (1996), 《後過渡期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全港與沙田的比較》,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王賡武 (1994), 《中國與海外華人》, 香港: 商務印書館。
- 吳乃德 (1994), 〈族群意識與自由主義——搜集台灣民族主義的基礎〉, 台灣政治學會第一屆年會學術研討會論文, 台北, 1994 年 12 月 17 日至 18 日。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 Baker, Hugh (1983), "Life in the Cities: The Emergence of Hong Kong Ma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5, pp. 469-79.
- Beran, Harry (1984), "A Theory of Secession," *Political Studies*, Vol. 32, pp. 21-31.
- Bond, Michael H. (1993), "Between the Yin and the Yang: The Identity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Chinese University Bulletin Supplement 31*, pp. 1-10.
- Breuilly, J. (1982),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han, Hoi Man (1994),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4* (edited by Donald H. McMillen and Man Si-wai),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p. 443-68.
- Choi, Po-king (1990), "Popular Culture," in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0* (edited by Richard Y.C. Wong and Joseph Y.S. Che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p. 537-63.
- Endacott, G.B. (1964),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Erikson, Erik H.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 Greenfeld, Liah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ürgen (1994),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ndition of Citizenship* (edited by Bart van Steenberg),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p. 20-35.
- Hobsbawm, E.J.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im, Samuel and Lowell Dittmer (1993), "Whither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n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edited by Dittmer and Ki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237-90.
- Kuan, Hsin-chi and Lau Siu-kai (1995), "The Partial Vision of Democracy in Hong Kong: A Survey of Popular Opin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pp. 239-64.
- 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1990), "Public Attitude toward Laissez Faire in Hong Kong," *Asian Survey*, Vol. XXX, No. 8, pp. 766-81.
- 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1988),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Lau, Siu-kai (1992), "Political Attitudes,"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0* (edited by Lau Siu-kai et al.),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pp. 129-57.
- Lee, Ming-kwan and Leung Sai-wing (1995), *Democracy, Capit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 4,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Smith, Anthony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Smith, Anthony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Tamir, Yael (1993),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Ujimoto, K. Victor and Gordon Hirabayashi (eds) (1980), *Visible Minorities and Multiculturalism: Asians in Canada*, Toronto: Butterworths.
- Weigert, Andrew et al. (1986), *Society and Identity: Toward a Sociologic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Lynn and Li Cheng (1993), "China Coast Identities: Regional, National, and Global," in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edited by Dittmer and Ki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54-93.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A Liberal Explanation

Timothy Ka-ying Wong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xisting ethnic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libe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and analyzes their relationships. Based upon the results of a telephone survey, the study finds that Hong Kong people have a very strong indigenous identity, showing high ethnic pride.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strongly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though mainly emphasizing the historical-cultural past, while feeling somewhat alienated from the existing Chinese nation-state and skeptical of the future Chinese national development. Moreover, the way Hong Kong people situate themselves between their ethnic identity and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is discernibly complicated. On the one hand, they tend to raise their ethnic identity above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seeing themselves more "Hongkongese" than Chinese, and defining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ng Kong.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re quite willing to help in Chinese national development, have a relatively clear concep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ty and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are very willing to strengthen their national education. As to liberal consciousness, the study discovers that over 60%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believe that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state and nation; more than 35% agree that Tibetans, Taiwanese and Hong Kong people themselves have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about 40% indicate that if conditions permit they will consider leaving Hong Kong. More importantly, the liberal consciousness of Hong Kong people is found to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ose who value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support self-determination or will consider leaving Hong Kong if conditions permit are more likely to identify with Hong Kong and less likely to identify with China. Such findings basically substantiate the previous liberal explanations of ethnic/national development, i.e., liberalism can be the foundation of ethnic awareness, of secessionism and of nationalism.